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 Knowledge in *Border Town*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Truth, Virtue and Beauty

TAN Enyi

Jisho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December 26, 2024

Accepted: January 20, 2025

Published: March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TAN Enyi. (2025).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 Knowledge in *Border Town*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Truth, Virtue and Beaut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1), 123–13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1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1.014>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2022 Hunan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Hunan Writer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ive Stylistics”(ProjectNo. 22WLH15) and 2024 Jishou University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Model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Hunan Novel A Dictionary of Maqiao”(Project No. 198)

Abstract: As a masterpiece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Border Town*, a local – color fiction, contains rich folk knowledg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thnic–minority fiction funding program, th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 knowledge can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explor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ruth, virtue and beauty in transknowletolog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folk knowledge in Jeffrey Kinkley’s version of *Border Town*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mely three kinds of knowledge related to customs, navigation and diet. Through analysis, it can be learned that in Kinkley’s translation, liberal translation and addition are frequently adopt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folk knowledge, which shows that flexibility in translation is important to its re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Thanks to that, the knowledge is able to be spread to the wider world.

Keywords: transknowletology; principles of truth, virtue and beauty; folk knowledge; *Border Tow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TAN Enyi is pursuing a master’s degree at Jishou University. Her majo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he translation study of minority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894500943@qq.com.



真、善、美原則下《邊城》鄉土知識英譯研究

譚恩怡

吉首大學

摘要：《邊城》是中國鄉土文學代表作，具有濃重的地方色彩，蘊含多樣的鄉土知識。隨著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作品對外翻譯工程的不斷推進，鄉土知識英譯研究對地方性知識的世界化路徑探索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本文基於知識翻譯學的真、善、美原則，從禮俗知識、行船知識、飲食知識三個維度考察《邊城》金介甫譯本中的鄉土知識英譯。研究發現，金介甫譯本在鄉土知識英譯中多採用意譯和增譯的翻譯方法，這體現了靈活翻譯對鄉土知識重構與傳播的重要性，有助於推動鄉土知識跨越文化障礙，走向廣袤世界。

關鍵詞：知識翻譯學；真、善、美原則；鄉土知識；《邊城》

基金項目：2022 年湖南省社科聯專案「敘事文體學視角下湘籍當代作家小說英譯研究」（專案編號：22WLH15）和「吉首大學 2024 年度研究生校級科研項目「中國文學國際傳播模式構建研究——以湖湘小說《馬橋詞典》英譯為例」（第 198 項）。

一、引言

作為一位現代湘籍作家，沈從文以其自創的文筆展現了一幅幅極其地方特色的鄉村風情畫卷，為中國鄉土文學的發展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Kinkley 在其著作中肯定了沈從文對中國鄉土文學發展的重要性，認為「或許有一天，他（沈從文）會成為全中國公認的第一位用現代散文來創作地方色彩小說的作家」（One day he may even be recognized as the first author to create a local-color fiction in modern prose for any Chinese region）^①。《邊城》是沈從文家喻戶曉的一部代表作，聚焦中國農村生活，展示湖湘文化，具有強烈的鄉土氣息和地方色彩，劉西渭譽其為「一顆千年不磨的珠玉」^②。崔志遠指出，鄉土小說指「以農村生活為題材，較為鮮明地描繪出地域的自然、文化景觀，民俗鄉風和社會心理，具有較為深刻的地緣文化意蘊的那部分小說」^③。王德威認為，「鄉土小說的特徵在於它對於鄉野人物、地方風俗、俚俗言語、節日傳統、禮儀風俗等等的記述，這些特徵構成所謂地方色彩的效果」^④。因此，鄉土文學與地緣文化緊密相連，而鄉土文學中所蘊含的鄉土知識也自然與地理環境相關。結合上述學者對鄉土小說的詮釋，可對鄉土知識進行界定：鄉土知識由一定自然環境區域的人民所創造，和文化緊密融合，包含人的生產生活經驗，體現人文精神，對當地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創造具有重要意義。作為鄉土文學經典，《邊城》取材於農村，融入了民俗鄉風、俚俗語言等鄉土知識，展示了湘西獨具魅力的地域文化。

以往圍繞《邊城》展開的翻譯研究多為基於視角主義的單一主體視域研究，聚焦語言與文化，忽略了最本質的知識生產與變遷。為助力鄉土知識的傳播，譯者需在求真的基礎上，通過翻譯助力溝通，提高目標文本在目的語讀者中的可接受度，推動不同主體間的對話與交流。因此，本研究基於知識翻譯學真、善、美原則，探討《邊城》的鄉土知識英譯，以期為鄉土文學外譯提供一定借鑒，助力鄉土知識的世界化傳播。

二、知識翻譯學及其真、善、美原則

2021年,《知識翻譯學宣言》一文的發佈宣告了知識翻譯學的問世,成為了翻譯批評和翻譯研究的又一新突破,引發學界的熱烈討論。知識翻譯學秉持「客觀意義上的知識論」,強調回歸翻譯知識本體,讓翻譯研究不再局限於語言轉換描述和過度文化闡釋,在繼承並超越文化轉向的基礎上實現了知識轉向,使翻譯研究得以回歸知識本原^⑤。

知識翻譯學認為,人在一定地理和物理環境中的生活經驗和實踐活動產生了知識,任何知識本質上都是地方性知識,知識翻譯學正聚焦於「地方性知識向世界性知識的生產變遷」^⑥。楊楓指出,任何翻譯「都是地方性知識的世界化社會行為,都是人類求真、求善、求美的生活化實踐」^⑦。在知識通過翻譯進入目的語文化世界的過程中,其地方性帶來了不可譯性的挑戰,為提高讀者的接受與認同,譯者需重視在翻譯中對真、善、美的追求,促進地方性知識間的流通。

知識翻譯學一經提出,便引起學界廣泛討論,眾多學者紛紛對知識翻譯學相關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和闡釋。陳大亮從不同方面對知識翻譯學進行了元反思,指出「知識在翻譯系統中處於中心地位,是聯通其他翻譯元素的關鍵要素」,強調了知識在翻譯研究中的重要性^⑧。孟祥春以「覺」「本」「性」「跨」「融」「生」「用」「道」「術」「學」十字對知識翻譯學進行了建構性闡釋,並討論了其譯名問題和部分概念構建,進一步推動了知識翻譯學的理论體系建構^⑨。金山針對「知識」的內涵與外延模糊問題,對「知識」進行了明確界定,指出知識具有的四個基本特徵,完善了知識翻譯學的理论體系基礎^⑩。學者們從理論、實踐等方面對知識翻譯學的豐富推動著該學說的不斷完善,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譯學的發展。

通過助力作者、讀者、譯者三個不同的主體之間互相溝通交流,知識翻譯學以知識再生產為中心,相容知識邏輯學、知識倫理學和知識美學,形成了一種求真、求善、求美的中和翻譯觀。知識翻譯學認為,「一個譯出的語義單位有兩部分,一是原意、本原,即各種類型的知識,其餘成分則是意識形態操控產生的文化成分」^⑪。由於「文化」一詞更使人想到文化的差異性,而知識一詞更使人聯想到知識的共同性,因而聚焦「知識」的翻譯學說可以讓翻譯從意識形態的束縛中脫離出來,更有利於世界和諧^⑫。基於這種中和翻譯觀,知識翻譯學在翻譯實踐方面主張真、善、美原則。岳峰和陳澤予從探討文化與知識何者為翻譯之重出發,對知識翻譯學的真、善、美標準進行了闡釋,從方法論層面對其進行了擴充^⑬。楊楓和李思伊解釋了真、善、美在方法論層面的哲學淵源、價值和內涵,指出了中和翻譯方法論在翻譯上的功能^⑭。陳婕基於真、善、美中和翻譯觀,闡釋了知識翻譯學視域下譯者主體性的發揮與制約,指出了譯者用知識武裝自身的重要性^⑮。

知識翻譯學視域下,「以真求知」、「以善立義」、「以美行文」是翻譯的「金規則」。「以真求知」是「翻譯實踐和理論的科學化要求」^⑯。「真」是翻譯的準繩,譯者對源文本須求真,注重理解源文本作者所要表達的真正含義;譯者對目標文本也須求真,堅持知識同一性,將對源文本的理解忠實完整地傳遞給目的語讀者,讓目的語讀者在閱讀時能夠產生與源文本讀者相同的感受。在此基礎上,「以真求知」原則常體現於異化策略的使用中,以傳遞未經修飾的「純知識」。然而,在翻譯實踐中,形式上的等同並非傳遞真知的必要條件,適當加工可以讓知識脫離語言的束縛,從而傳達真義。「以善立義」是對「翻譯實踐和理論不可譯性的語言對抗與倫理性約束」^⑰。「善」約束著譯者的翻譯活動。在翻譯中,譯者須與源文本為善,面對知識的地方性所帶來的不可譯性挑戰,應在尊重源文本的基礎上進行適當闡釋,避免隨意改編。同時,譯者須與讀者為善,通過闡釋讓知識打破意識形態的枷鎖,幫助讀者看到知識的本原,助力溝通。換言之,譯者須在「善」的約束下,從讀者的角度進行翻譯選擇,在傳遞知識的目的下靈活翻譯,在譯文中體現其善心。「以美行文」是「知識的世界化要求」^⑱。譯者求美,譯文為美,知識才更為讀者所接受與認同。正如胡開寶和李翼所指出,



「我們的文學英譯活動不應僅僅考慮翻譯作品的文學性，還應考慮目的語社會文化語境中影響及制約翻譯活動的各種文化、社會、政治等因素，如英語國家的文學觀念、詩學傳統、意識形態、目標讀者的審美趣味、閱讀需求、閱讀習慣等」¹⁵。地方性知識向世界性知識的流動離不開讀者的接受，基於目的語讀者的審美標準順勢而為，讓真知以美的姿態流向目的語文化世界，知識間才會更好地轉化與流通。在翻譯實踐中，譯者須對讀者的審美傾向有一定瞭解，同時在翻譯時向其審美標準靠攏。如果不對讀者的感受加以考慮，一味讓讀者閱讀生澀甚至有誤的譯文，知識傳播將陷入原地踏步的窘境。

三、《邊城》金介甫譯本研究現狀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中華民族從土裡長出光輝的歷史，鄉土文學也自然在中國文學裡長據一席之地。沈從文的代表作《邊城》是中國鄉土文學的經典之作，具有強烈的鄉土氣息。自 1934 年出版以來，《邊城》先後被譯為多種外文在數十個國家出版。其生命力在英語世界中為最強，迄今已有四個英譯本。其中，美國漢學家金介甫 2009 年出版的「Border Town」為最新譯本，與 1936 年項美麗（Emily Hahn）和邵洵美合譯的首個英譯本跨越了 73 年之久，足見《邊城》的「鄉氣」直至新世紀仍對譯者和讀者具有較強吸引力。

在《邊城》英譯研究中，相比於其他三譯本，學界目前對金介甫譯本更為關注。Minhui Xu 以《邊城》金譯本為例，分析了學術型譯者在文學翻譯中的策略傾向，並提出如下推論：一旦選定翻譯文本，譯者的立場和慣習較之原作者和來源語言可能更具決定性力量；譯者積累的資本越多，隨心翻譯的自由度越大；譯者的學術背景越深厚，其翻譯便越重視源文本¹⁶。劉汝榮將金介甫譯本置於操縱理論框架中考察文化移植的操縱因素和實現途徑，認為個人意識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分別影響譯者的選擇，文本內、外因素共同影響原語文化移植，強調關注譯者身份¹⁷。盧國榮和張朋飛通過分析金介甫譯本在具體翻譯策略上的選擇，總結了金譯本的成功之道，為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建言獻策¹⁸。王建國和謝飛對《邊城》四譯本進行了量化統計和對比分析，指出相較于源文本，譯本更具結果取向，且英語母語者的結果取向思維更為突出¹⁹。

目前，針對金介甫譯本所展開的翻譯研究多從語言、文化角度展開，局限於意識形態的操縱之下，針對知識遷移與生產層面的研究仍舊缺失。邵璐和劉彩霞基於認知文體學，探討了民族文學譯介中的地域特徵識解機制，強調了文本的地域特徵在民族文學譯介中的重要性²⁰。《邊城》中的各類鄉土知識正是文本地域特徵的集中體現，其英譯研究對民族文學的世界化傳播具有重要意義。在以往關於鄉土知識的譯介研究中，學者們大多針對鄉土語言的翻譯進行探討，涉及主題較為廣泛，如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等，從知識傳播層面展開的研究不多。鑒於此，本研究結合知識翻譯學真、善、美原則，考察《邊城》金介甫譯本的鄉土知識英譯，以期探究鄉土知識的世界化路徑。

四、真、善、美原則下《邊城》的鄉土知識英譯

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經歷了從傳統鄉村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變遷。而在文學領域，那一抹鄉土印記始終以其「民族性和社會性」印刻在中國文學中²¹。「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²²。《邊城》作為一部經典鄉土小說，展現了鄉土中國所特有的「鄉土性」。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將中國社會的「鄉土性」歸結為三個層面：「離不了泥土」、不流動性和熟人社會²³。《邊城》以小鎮茶峒及其附近鄉村為背景，聚焦於農村生活，刻畫了一對世代守在溪邊擺渡的爺孫形象。老人五十年如一日守在溪邊，為人擺渡，河街上人人知其忠於職守，常贈與些許東西以示敬意。《邊城》所描繪的這幅民風淳樸的鄉村風俗畫卷，正是「鄉土性」在湘西這一方水土上的詮釋。結合前文定義，通過分析《邊城》中所涉及的鄉土知識，發現禮儀風俗、行船術

語、飲食文化三個方面較為突出。因此,本文基於知識翻譯學的真、善、美原則,考察上述三個層面所涉及的禮俗知識、行船知識和飲食知識在《邊城》金介甫譯本中的英譯方式以及在翻譯過程中的知識創造,以期探尋鄉土知識的世界化道路。

(一) 禮俗知識英譯

「禮俗」即禮儀和風俗,連接著思想文化和社會樣態。禮俗秩序的構建增強了社會凝聚力,促進社會良性運行。正如龍曉添所說,「在社會事實層面,化俗成禮,禮與俗對話,並共同規約社會秩序」²⁵。禮俗與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密切相關。鄧子琴比較了中西社會的禮俗形式,指出禮俗「因社會不同,而生之差異。社會不同,禮俗之形式,即因之而異」²⁶。大較言之,中國為農業社會,西洋為工商業社會。故禮俗之差殊,此其關鍵也」。社會形態的不同決定了禮俗形式的差異,其中蘊含的禮俗知識也自然大相徑庭。《邊城》以少女翠翠的愛情故事為主線,融入湘西地區的婚嫁、喪葬禮俗,展示了湘西獨特的禮俗文化。潘斌指出,「禮俗……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若不知中國禮俗,就很難真正認識中國社會」²⁷。因此,禮俗知識的建構與遷移對於知識的聯繫與流通具有重要作用,對於提高中國鄉土知識在世界知識體系中的認同程度也具有重要意義。

例 1.

源文本:女孩子的母親,老船夫的獨生女,十五年前同一個茶峒軍人唱歌相熟後,很秘密地背著那忠厚爸爸發生了曖昧關係。²⁸

目標文本:The girl's mother, the ferryman's only child, had some fifteen years earlier come to know a soldier from Chadong through the customary exchange of amorous verses, sung by each in turn across the mountain valley. And that had led to trysts carried on behind the honest ferryman's back.²⁹

在本例中,翠翠的父母親因唱歌而相識相熟,這是湘西民眾常見的一種文化行為。對於湘西兒女而言,唱歌已成為一種文化習俗滲透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湘西的唱歌習俗正印證了「音樂和美術活動成了一個區別不同群體的標誌」³⁰。人們既善歌,也學歌。湘西民眾通過唱歌抒發情感、表達意志,這不僅是一種儀式習俗,更是文化驅動下的一種基本生活方式,通過耳濡目染代代傳承、生生不息。唱歌是湘西兒女表達情感的主要方式,不同場合對應不同的歌曲,題材廣泛、內容豐富。《邊城》中有多處都記述了湘西地區的唱歌習俗,如大老和二老約定半夜到高崖上唱歌,試圖唱動翠翠的心,以及在爺爺死後,老馬兵為眾人唱喪堂歌以消磨時間。人們借歌抒情,將歌唱與談情說愛、婚慶喪葬、生產勞動等方面相結合,呈現出「一種整體性的文化現象」³¹。翠翠的父母親因歌結緣,這種「唱歌」是湘西青年男女擇偶的方式之一。在如三月三「趕邊邊場」等節日裡,青年男女們隔著溪水或山崖互相對歌、談情對唱,情投意合者再到一邊繼續盤歌。綜上可知,「唱歌」在湘西地區有豐富的文化意蘊,在該地區的語境中聚合了多樣的知識。「以真求知」原則強調讓翻譯實踐科學化,要求譯者將自己對源文本的理解原原本本地傳遞給讀者,讓讀者在閱讀目標文本時能夠獲得「真知」。「真知」的傳遞要區分獨有知識和共有知識,金譯本便做到了這一點。唱歌這一行為無疑是共有知識,中西社會不論男女老少都能隨意哼上一曲兒,但當唱歌作為一個地區的習俗時,其文化內涵、行為模式等便屬獨有知識。金介甫作為《邊城》的譯者,同時也是一位學者,他在「唱歌」這一習俗的翻譯上「求真」,也實現了通過翻譯「求知」的目的。在金譯本中,金介甫對唱歌習俗採用了增譯的翻譯方法,並未簡單地以「唱歌」二字草草帶過,而是在理解的基礎上對該知識進行了重構,採用文內解釋的方式將唱歌習俗的形式、內容、地點簡潔地告知讀者,補充了其中隱含的知識,對讀者做到了傳真、傳知。



例 2.

源文本：過了四七，船總順順派人來請馬兵進城去，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作為二老的媳婦。^{②6}

目標文本：When the fourth week of mourning had passed, Fleetmaster Shunshun sent a man to ask the horseman back to town. He proposed that Cuicui come into his home, as the future wife of No. 2. ^{②7}

「七」是中國喪俗中一個特殊的數字。史小軍和郭俐兵指出，「我國古代以『七』為節律的社會風俗以及民間信仰是『祭七』發生的土壤」^{②8}。「祭七」以「七」為核心，在古代與儒、道、佛緊密相關，宗教色彩濃重，而在近代則多為一種葬後祭禮。這種祭禮在民間一般稱為「做七」，在《紅樓夢》《金瓶梅》等小說中均有涉及。「做七」指家屬為逝者每隔七天進行一次的祭奠儀式，這種儀式一共要進行七次，共計七七四十九天。第一個七天稱為「頭七」，第二個七天稱為「二七」，以此類推，本例中的「四七」則為爺爺死後的第四個七天。金譯本並未按照字面意義簡單地將「四」與「七」進行組合，而是採用了意譯的翻譯方法，將「四」處理為序數詞，將「七」用具有七天含義的「week」來表示，同時添加「mourning」一詞用以解釋是祭禮的第四周。在充分理解源文本的基礎上，金譯本對「四七」這一禮俗知識進行釋義以提高目標文本的可讀性，這一處理既體現了對源文本的尊重，又促進了讀者對知識的理解，與「以善立義」原則相契合，正是「善譯」的體現。同時，該知識的重構也體現了金譯本對「美」的追求。如前所述，「七」在宗教中的文化意蘊豐富，在喪禮中為「第七日」。西方喪禮中並無這一概念，而七日正好為一周，金介甫用「week」一詞進行替換，用詞平實精練，巧妙地使目標文本保持了流暢性與可讀性，知識因而以美的姿態呈現在讀者面前，金譯本的「行文之美」也由此可見。

（二）行船知識英譯

沈從文筆下的邊城茶峒一面近山、一面臨水，環繞茶峒的河流便是酉水。茶峒臨水一側設有碼頭，供船隻運送雜貨，城中建築也因季節漲水而多為吊腳樓，這些都奠定了《邊城》與水緊密相關的基調。這方小城是酉水上湖南界內最後一個水碼頭，四川東部貨物的進出口都從茶峒落水起岸，小說中也自然有許多與行船相關的鄉土知識，體現了湘西人民在水上的經驗與智慧。

例 3.

源文本：初五大清早落了點兒毛毛雨，河上游且漲起了「龍船水」，河水已變作豆綠色。^{②9}

目標文本：A fine rain was falling at daybreak on the fifth of the month. Rising water levels upstream had provided the seasonal “Dragon Boat tide” and the river was already pea-green. ^{③0}

「龍船水」也叫「龍舟水」，與華南地區端午節前後常出現的強降雨現象有關。端午節前後，華南地區暖濕氣流與北下的冷空氣交匯，產生大範圍的降雨，河流水位也因此上漲，正適合端午時期的龍船競渡，因此民間便將這種由強降雨引起的水位上漲稱為「龍船水」。「以真求知」原則「要求譯者盡可能充分保持文本的他者特徵」^{③1}。在金譯本中，「龍船水」譯為「Dragon Boat tide」，這一處理不僅保留了「龍船」的意象，準確完整地傳遞了源文本的顯性知識，同時用「tide」一詞彰顯了「龍船水」上漲時的動態特徵，體現特殊的水位變化之勢，保留了源文本知識之真。在傳遞顯性知識之余，金譯本對源文本蘊含的隱性知識同樣關注。「龍船水」是一種季節性水位變化現象，在民間還有如「桃花水」等對不同時節水位變化的描述，是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對自然變化的經驗總結，也是勞動人民的智慧體現。在對「龍船水」這一知識的處理中，金介甫在充

分理解源文本的基礎上增譯了「seasonal」一詞,譯出了其中的隱性知識,補充了這種水位變化的季節性特徵。在譯本最後,譯者通過注釋對「龍船水」這一知識進行了進一步補充,解釋其為「High waters said to arrive on the second or third day of the fifth lunar month」。通過文外注釋,相關資訊得以補充,目的語讀者可獲得與源文本讀者相同的理解,從而獲取「真知」。

例 4.

源文本:祖父明白翠翠為什麼事不高興,便唱起搖櫓人駛船下灘時催櫓的歌聲,聲音雖然啞沙沙的,字眼兒卻穩穩當當毫不含糊。^⑥

目標文本:Realizing why she was angry, Grandpa began singing a shanty the oarsmen used to speed their rowing while they shot the rapids. His voice was rasping, but the words were clear as could be. ^⑦

茶峒人民臨水建城,從水裡長出日常,其生活早已與水密不可分。舊時,在水上行船主要依靠人力驅動的時期,「櫓」的出現有效提高了艚公的行船效率,比劃槳要省力許多,甚至有「一櫓三槳」的說法,是中國農業社會水上人行進的重要工具,也由此衍生出了許多與「櫓」相關的鄉土知識。在本例中,源文本劃線處兩次出現了「櫓」的意象,這種重複是漢語中的常見現象,而英語文化世界並不提倡重複,也不如漢語世界強調意象的表達。在金譯本中,「搖櫓人」和「催櫓」兩詞的翻譯都使用了意譯的翻譯方法,弱化了「櫓」的意象,將翻譯重心放在源文本作者的主要表達意圖上,對兩詞分別進行了釋義,以達成「善譯」助力讀者理解。在「搖櫓人」的翻譯中,金譯本突出傳遞這一崗位的身份資訊,用「oarsmen」一詞簡潔明確地表明該崗位的工作性質,即劃手;而在翻譯「催櫓」時,譯本中選擇突出「催櫓」的目的,即讓搖船人通過有節奏的歌聲一同協作划船,保持船的行進,因此消解了「櫓」的意象,譯為「speed their rowing」。源文本語言習慣上的差異帶來了翻譯的不可譯性,如果強行保留源文本中「櫓」的意象,目標文本將趨於僵化、缺乏生氣,難以傳真,也有違譯心之善。金譯本在尊重源文本的基礎上進行了適當釋義,這種處理不僅顯示了金介甫作為源文本讀者尊重源文本之「善」,也體現了其作為目標文本作者為目的語讀者考慮之「善」。正是這種「善譯」構築了一條知識橋樑,讀者也因而得以感受知識之善。

例 5.

源文本:翠翠哧地笑了:「鳳灘茨灘不為凶,上面還有繞雞籠;繞雞籠也容易下,青浪灘浪如屋大……」^⑧

目標文本:That brought a chortle from Cuicui.

Phoenix Rapids, Puncture Vine Rapids, aren't the worst to rage,

Just go downstream and there is still the Twirling Chicken Cage;

But Twirling Chicken Cage yet lacks the most ferocious foam,

The waves at Green Foam Rapids are big as any home^⑨

酉水是沅江最大的支流。在沅江修建水電站前,沿江兩岸都是原生態的自然景觀。由於江上多險灘,行江人到水流湍急的河段往往需格外小心。雖然險灘給沅江舊時的水上運輸帶來不便,但兩岸人民仍然在生產勞作中積極將其融入生活,形成了相關俚俗語言,甚至發展出了「灘師」等水上職業。本例中,翠翠所說的便是記述沅江上險灘的俗語。劉宓慶指出,「漢語是一種母音佔優勢的語言,尤其講究文學語言的尾韻」^⑩。本例劃線處的俗語同樣講究尾韻,源文本的「凶」和「籠」以及「下」和「大」分別押韻,為雙部韻,詞的

韻式讓該俗語朗朗上口,體現了其語音美。而在金譯本中,金介甫在形式和語音層面分別注重了「以美行文」。在形式上,源文本每個小句在目標文本中都單獨成行,句長相近,外在形式的空間上更顯統一,正符合西方美學「美的三要素」中的「和諧」^⑩。在語音層面,目標文本中的「rage」與「Cage」都以/eɪ/為尾韻,而「foam」與「home」都以/əʊ/為尾韻,這種尾韻上的押韻節奏一致,採用了 aabb 的押韻方式,平添了目標文本的音樂性,體現了音律美。「以美行文」原則強調讓知識以美的姿態流至目的語世界,而金譯本在形式和語音層面都保證了讀者的審美體驗,符合讀者對美的追求,鄉土知識也因符合讀者的期待而獲得進一步流通。

(三) 飲食知識英譯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食是人類生產生活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因而談論鄉土知識時自然離不開飲食知識。飲食文化常常反映一定自然環境區域的地域特徵、物產情況以及人文風貌,一道小小的菜品便可展現一個民族的飲食心理。作為鄉土文學經典之作的《邊城》,其所具有的鄉土氣息也離不開書中一道道湘西美食的映襯,這些美食反映了湘西人民的飲食習俗,蘊含了湘西兒女在一座小小邊城中努力紮根生長的勤勞與智慧。來自不同文化世界的讀者亦可通過一道道美食觀察不同民族的生活日常,在獲取新知的同時感受飲食所承載的民族文化。

例 6.

源文本:不久,那一夥人來了,兩個吹唢呐的,四個強壯的鄉下漢子,一頂空花轎,一個穿新衣的團總兒子模樣的青年,另外還有兩隻羊,一個牽羊的孩子,一壇酒,一盒糍粑,一個擔禮物的人……^⑪

目標文本: Soon the wedding procession arrived: two men playing suonas, four strong peasant lads carrying an empty palanquin to collect the bride, a young man decked out in new clothes, who looked to be the son of a militia captain, two sheep and a young boy leading them, a vat of wine, a box of glutinous rice cakes, and a gift-bearer. ^⑫

水稻是中國主要種植的生產作物,由稻米製成的美食自然不在少數,其中就包括「糍粑」。「糍粑」是流行於中國南方地區和西南地區的一道小吃,一般以糯米為原材料,將糯米煮熟搗成泥狀,再整理成一個個長條或圓餅即製作完成,還可以伴以其他佐料用於增味,在節日或豐收時餐桌上往往都會出現「糍粑」的身影。「糍粑」口感粘糯,象徵著喜慶與團圓,彙聚著不少中華兒女的鄉情記憶。而在西方世界,糧食方面的生產以小麥為主,其飲食小吃也多以麵粉製成,這種地緣文化和飲食習慣上的差異自然導致了飲食知識在世界化過程中的不可譯性。為打破意識形態的束縛,促進知識的世界性流通,譯者需達成「善譯」,進行不可譯性的語言對抗。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粑」指餅類食物,「糍粑」為把糯米蒸熟搗碎後做成的食品。在對「糍粑」這一飲食知識的處理中,金譯本保留了製作糍粑的原材料「rice」,同時用「cake」指出糍粑是一種餅類食物。值得注意的是,金譯本在對「糍粑」的翻譯中增譯了「glutinous」一詞。孟祥春指出,「個體與個體、群體與群體、國家與國家之間均存在『知識剪刀差』」,即不同個體、群體、國家間所具備的知識存在差異,某個群體尚未通曉的「發生知識」或許是另一群體已掌握的「既成知識」,譯者在翻譯中需要化解這種「知識剪刀差」^⑬。在金譯本中,譯者增添了對糍粑口感的描述,用「glutinous」一詞顯示了糍粑在口感上最突出的特性——粘。對於具有不同飲食習慣的西方讀者而言,並非所有讀者都通曉糯米製品的口感,這對其而言為「發生知識」,而對以稻米為主食的中華兒女來說,糍粑的口感為「既成知識」。金譯本借食物口感提高了目標文本與讀者的關聯性,即使無法即刻品嚐,目的語讀者仍可憑過往經驗想像其口感,感受中華美食的獨特。通過語言上的對抗,金譯本化解了「知識剪刀差」,助力知識跨越文化的障礙,正體現了譯者助力溝通的善心,也體現了

金介甫在翻譯中的「以善立義」。

例 7.

源文本：有時缸里加些茶葉，有時卻只放下一些用火燒焦的鍋巴，趁那東西還燃著時便拋進缸裡去。

目標文本：Sometimes she'd add tea leaves; other times, she'd just drop in some burned crusts from their cooked rice.

在中國民間飲食中，「鍋巴」也是由稻米為原料製成的美食之一。「鍋巴」是爛飯時貼著鍋的一層飯焦，有健胃、助消化的功效，中國民間常常用其泡水或作零食吃，是以稻米為主食的中國農業社會所創制的一道美食。細究「鍋巴」的命名構成，「鍋」泛指爛飯時所用的所有鍋具，而「巴」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意為「粘在別的東西上的東西」，二字的詞義組合便是「粘在鍋具上的東西」。從名稱的表面釋義來看，「鍋巴」的命名指明了製作這一美食的烹飪用具及美食的特性，即緊貼在鍋上，但從源文本讀者的反應來看，「鍋巴」一詞理所應當地指爛飯時產生的那一層飯焦，這一美食的原材料、製作方式、口感對源文本讀者來說不言而喻，但「鍋巴」這一名稱的釋義並未涉及其本質特徵，不足以讓目的語讀者產生相同的感受。「以真求知」原則提倡將譯者對源文本的理解忠實完整地傳遞給目的語讀者。在金譯本中，金介甫將「鍋巴」譯為「crusts from their cooked rice」，這一處理將「鍋巴」這道美食的本質特徵完整準確地呈現在目標文本中，其知識內涵也得到了清晰表達，讀者在閱讀目標文本時可獲得充分理解，還可從該釋義中獲取真知、新知。金介甫在「鍋巴」一詞的處理上採用了意譯，這一翻譯方法也體現了其在美學上的考慮。在西方美學譯論中，西塞羅擁護自然美和氣勢美，反對「詞對詞」翻譯，提倡「意義對意義」的翻譯原則，這一翻譯主張推動了西方譯論的發展。在本例中，金譯本並未僵化地逐詞忠於源文本，而是在充分理解源文本的基礎上進行了變通，不僅通過補充讓讀者進一步感受知識之真，還提高了目標文本的可讀性，保持了目標文本的自然美，真正實現讓真知以美的姿態流向目的語讀者。

五、結語

本文結合知識翻譯學真、善、美原則，從禮俗知識、行船知識、飲食知識三個方面探究《邊城》的鄉土知識英譯情況。分析發現，金譯本在鄉土知識英譯中主要採用意譯和增譯的翻譯方法。在充分理解源文本的基礎上，金譯本通過增譯增添相關資訊以保證讀者理解以及獲取新知，這正與「真譯」和「善譯」相契合，目的語讀者能夠充分理解、感悟知識之真。同時，在意譯的處理下，譯本行文流暢，目標文本保持自然美，鄉土知識經意譯重構保持其美學特性，也提高了其在目的語讀者中的可接受度，體現了金介甫的「美譯」。另外，這種意譯與增譯的頻繁使用也體現了靈活翻譯對鄉土知識再生產的重要性，對鄉土文學的譯介具有重要意義。在尊重原文的基礎上，對譯文進行適當調整將有助於提高地方性知識的世界性認同程度，更有利於知識傳播。在《邊城》金介甫譯本中，鄉土知識的英譯情況體現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求真、求善、求美，鄉土知識也在其對真、善、美的追求中跨越重重障礙，踏上世界化道路。由此可見，知識翻譯學真、善、美原則可以指導鄉土文學中鄉土知識的加工與重構。在本研究中，筆者僅將知識翻譯學真、善、美原則用於討論《邊城》中鄉土知識的英譯情況，而在翻譯中，所有待翻譯的內容都可視為知識，因此真、善、美原則還可用於考察不同類型文本中各類知識的英譯。

注释

① Kinkley, J. C. (1987).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② 劉勇,張睿睿:《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走進沈從文的〈邊城〉》,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頁136。
- ③ 崔志遠:《鄉土文學與地緣文化:新時期鄉土小說論》,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年版,頁11。
- ④ 王德威:《寫實主義小說的虛構:茅盾,老舍,沈從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274。
- ⑤ 楊楓:《知識翻譯學的翻譯定義與分類》,《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1期,頁1-2。
- ⑥ 楊楓:《知識翻譯學宣言》,《當代外語研究》,2021年第5期,頁1。
- ⑦ 楊楓:《知識翻譯學論綱》,《當代外語研究》,2023年第4期,頁1-2。
- ⑧ 陳大亮:《關於知識翻譯學的元反思》,《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2期,頁45-57。
- ⑨ 孟祥春:《「知識翻譯學」命名與概念構建》,《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3期,頁55-64。
- ⑩ 金山:《知識翻譯學中「知識」的內涵、外延與定義》,《外語電化教學》,2023年第6期,頁20-24,108。
- ⑪ 岳峰,陳澤予:《從知識翻譯學的真、善、美標準談知識翻譯學的英語譯名》,《當代外語研究》,2022年第3期,頁65-73。
- ⑫ 潘文國:《翻譯研究的新突破》,《外語電化教學》,2023年第1期,頁7-10,106。
- ⑬ 楊楓,李思伊:《真善美:作為方法論的中和翻譯》,《中國翻譯》,2024年第1期,頁9-15,189。
- ⑭ 陳婕:《中和翻譯視閥下的譯者主體性闡釋》,《當代外語研究》,2024年第3期,頁74-82,95。
- ⑮ 胡開寶,李翼:《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英譯對外傳播:現狀、問題與對策》,《英語研究》,2023年第1期,頁35-46。
- ⑯ XU Minhui. (2012). On scholar translator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f Kinkley's translation of 「Biancheng」.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20(2), 151-163.
- ⑰ 劉汝榮:《金介甫英譯〈邊城〉中文化移植的操縱理論考察》,《外語學刊》,2014年第6期,頁154-158。
- ⑱ 盧國榮,張朋飛:《〈邊城〉金介甫英譯本的成功之道》,《當代外語研究》,2016年第1期,頁71-77。
- ⑲ 王建國,謝飛:《論漢英語用差異對翻譯的影響——基於對〈邊城〉四譯本的對比分析》,《中國翻譯》,2020年第3期,頁100-109,189。
- ⑳ 邵璐,劉彩霞:《民族文學的地域特徵識解與翻譯研究——以阿來的中短篇小說集〈藏魂〉英譯為個案》,《阿來研究》,2022年第2期,頁22-35。
- ㉑ 汪璧輝:《沈從文海外譯介與研究》,《小說評論》,2014年第1期,頁84-89。
- ㉒ 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頁1-9。
- ㉓ 龍曉添:《禮俗互動中的多元一體秩序構建——以喪葬禮俗為例》,《民俗研究》,2023年第5期,頁35-48,157。
- ㉔ 鄧子琴:《中國禮俗學綱要》,南京:中國文化社1947年版,頁28。
- ㉕ 潘斌:《「禮俗互動」概念的學術價值及獻疑》,《民俗研究》,2024年第4期,頁5-18,157。
- ㉖ 沈從文:《邊城》,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
- ㉗ Kinkley, J. C. (2009). *Border Tow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㉘ 麥克爾·赫茲費爾德:《什麼是人類常識》,劉珩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頁306。
- ㉙ 吳曉:《湘西苗歌的文化身份想像》,《廣西社會科學》,2009年第9期,頁101-104。
- ㉚ 史小軍,郭俐兵:《「祭七」源流考探》,《文化遺產》,2019年第2期,頁77-85。
- ㉛ 劉宓慶:《翻譯美學導論》,北京:中譯出版社2019年版,頁54,95。

(Editors: LI Ruobing & JIANG Qing)